



法兰西的特性

空间和历史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商务印书馆

法 兰 西 的 特 性

空 间 和 历 史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 良 张泽乾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4年·北京

Fernand Braudel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Espace et Histoire
Flammarion, 1990

据法国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0年版翻译

本书由法国文化部赞助出版

FĀLÁN XĪ DE TÈXÌNG

法兰西的特性

空间和历史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著

顾良 张泽乾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21-1/K·402

1994年10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80千

印数2000册

印张11 3/4

定价: 11.70元

布罗代尔与年鉴派

——译者代序

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埃马努埃尔·勒鲁瓦—拉杜里声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够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① 眼明人立即就会懂得，这里所说的“最好的历史学家”指的是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三人。

有鉴于我国史学研究的滞后和公众对历史的冷淡，一位人微言轻的翻译匠决心把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年鉴派”及其第二代宗师布罗代尔的著作介绍给我国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和一切怀有求知愿望的读者。就这样，我在近十多年来，首先与挚友施康强先生合译了《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简称《物质文明》），接着应商务印书馆之请，对《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简称《地中海》）上卷的译文从事通读校订；最后与张泽乾先生联手，完成了《法兰西的特性》一书的翻译工作。

时至今日，《物质文明》已于199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地中海》上卷正在印刷中，《法兰西的特性》即将全部交稿。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三部被一般法国人视为难懂的“天书”，我想利用这个机

^① 埃马努埃尔·勒鲁瓦—拉杜里：《新史学的斗士们》，见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第791期，1980年1月7—13日。

会，客观地讲述一点背景材料。对于一位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历史学家，我既不赞成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又讨厌那种“戴帽穿靴”式的政治标签。因此，我将着重在自认为值得借鉴的地方落笔，而不在批判方面多费口舌。相信读者会比译者高明，不但能发现这位史学巨匠闪烁着思想火花的真知灼见，而且会对他匆忙作出的某些结论进行独立思考。

一、新史学的崛起

法国是个具有光辉史学传统的国家。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一些法国历史学家往往骄傲地声称：在美国还没有摆脱殖民统治时，法国已培育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历史学派。确实，早在17和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界堪称人才辈出。首先是以记叙亲身经历为主的“人文派”，他们撰写的“回忆录”不但是脍炙人口的文学篇章，而且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素材。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伯父圣西门伯爵即以其《回忆录》传诸后世。其次是精确记述事实的“博学派”，其特点表现为比“人文派”更加严谨，对社会现象不作渲染，这派历史学家尤以教士居多。最后是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哲学派”，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一书至今仍被奉为史学经典论著，而《关于历史的新认识》今天还被尊崇为“新史学的蓝本”^①。我们几乎可以说，光辉灿烂的“启蒙时代”在法国不仅是哲学的时代，而且是历史学的时代。

通过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法国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要求人们对刚刚结束的社会动乱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展望今后的发展方向。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巨著随之脱颖而出。这些历史学家往往也是活跃政坛的头面人物，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反

^①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50页，1987年8月15日。

映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如拉马丁、基佐、梯也尔、米希莱、路易·勃朗等。恩格斯曾经指出，早在马克思以前，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已经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并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①。不仅如此，法国新史学派还把夏多布里昂、基佐、米希莱等人视为自己的“祖先”和“预言者”。^②

建立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基础之上的兰克学派，强调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对开展文献档案的考证，冲淡法国史学的浪漫色彩，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从而把以激励民族精神、垂训说教为宗旨的旧史学推进了一大步。但这种史学研究在其后期逐渐偏向于对个别轰动一时的历史事件和少数杰出人物的身世言行进行不厌其烦的考证，其题材就局限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的范围之内。在夏尔—维克多·朗格多瓦的《菲利普三世的统治时期》一书中，人们所能接触到的几乎只是13世纪法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证史学更走进了繁琐考证的死胡同，法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倡导挣脱纯政治因素的羁绊，务求冲出重大历史事件的框框，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拓展研究领域。在法国新史学的这个萌芽时期，为幼苗浇水施肥的园丁主要是杜尔克姆的《社会学年报》和昂利·贝尔的《历史综合评论》。作为兼通多门学科、知识渊博的社会学家，杜尔克姆率先发难，对统治法国高等教育、以政治史为中心的传统史学发动了攻击，主张通过对典型史实的考察，认识社会的结构和运动，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解剖一只麻雀”。昂利·贝尔则反对满足

^①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四卷，第245—246页。

^②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50—52页，1987年3月15日。

于史料的堆砌，强调通过分析比较，作出综合的解释，而对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综合”，又有赖于全面运用社会科学各门类的知识。

此外，对新史学的诞生曾起过有益影响的还有：弗朗索瓦·西米安的以价格运动、工资升降为内容的经济史，以维达尔·德·拉布拉什为代表的法国地理学派，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思想。应该看到，新史学的一些杰出代表，包括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内，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甚至怀有某些好感。^① 雅克·勒高夫公开承认马克思主义对新史学的影响，强调“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不相容”，“在许多方面，如带着问题研究历史、跨学科、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②

新史学派正式问世的日期要从1929年算起，也就是从吕西安·费费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赫(1886—1944)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那天算起。这份杂志的名称“年鉴”立即就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年鉴派”至今仍与“新史学派”相混同。这个刊名的两个修饰语，特别是“社会”一词，是刊物的两位创始人考虑到历史的无所不包而特地选定的。费费尔说：“我们完全知道，在眼下，‘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太广而最后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我们一致认为，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充当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约束的刊物的名称……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

① 参看安德烈·比尔基埃尔的《历史科学辞典》，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在一次谈话中，当有人问到他同马克思的关系时，布罗代尔说：“其实，与同马克斯·韦伯的关系相比，我的观点与马克思更加接近”，以马克思的跨学科研究精神，他认为可派马克思担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除院长之外的任何一项职务。谈话全文见法国《世界报》1979年12月14日，第23版。

② 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57页，1987年3月15日。

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①

年鉴杂志虽在巴黎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出版，但其编辑中心却设在位于法国北部边境的斯特拉斯堡。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人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应聘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教授，他们不仅把在该校共事的其他任课教师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学者，如社会学家莫里斯·霍尔巴赫，经济学家安德烈·齐格弗里特，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等），而且在校外乃至国外争取广泛的支持，费弗尔和布洛赫甚至曾考虑请他们极其佩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昂利·皮雷纳担任年鉴杂志的主编。从创刊的第一年开始，为杂志撰稿的作者分属英、意、西、比、德以及美国、匈牙利、丹麦、瑞典、捷克、希腊等国家。文章的内容除历史外，还涉及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广阔领域。

年鉴杂志的两位创办人配合默契，但又各有专长。马克·布洛赫主要是欧洲中世纪史和经济史的专家，他把杜尔克姆的社会学的比较方法移植到历史研究中来，完成了他的两部代表作：《法国乡村史的特点》（中译本作《法国农村史》）和《封建社会》。两部巨著打破了改朝换代、帝王将相这些纯政治因素的框框，对法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解剖，展示出千百万基层群众和成千上万优秀人物的风采。《法国乡村史的特点》是把社会实体的主要组成成分，即大多数农民，复活成栩栩如生的真人；《封建社会》则生动地刻画了高雅的名门贵族和粗俗的暴发户新贵，以及这两股势力在乡村中组成的附庸体系。

吕西安·费弗尔也是中世纪史的专家，但他的研究侧重在思想、文化和精神状态方面。无怪乎今天在法国流行的“精神状态

^① 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53年版，第19—20页。

史”即奉他为鼻祖。费弗尔十分重视地理环境对人文氛围的影响。他的博士论文《菲利普二世与法朗什—孔泰》堪称是法国地方史的楷模，其特点是把一个省的地理因素融合到前工业化时代的社会演变中去。《大地与人类进化》写于1922年，在法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保罗·夏吕为该书作序时写道：该书为今后的历史学家在如何处理社会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树立了“样板”。^① 费弗尔的《拉伯雷的宗教》和《马丁·路德的命运》绝非简单的人物传记，而是透过这两位典型人物，“重现”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并把它们同当前的精神面貌进行比较。

但是，以上介绍的几部代表作其实还并不真正代表布洛赫和费弗尔两人的业绩。他们不单是知识渊博、擅长考证的学者，而且更多是精力充沛、能言善辩的论战家。他们的主要作战阵地就是年鉴杂志。在新史学或年鉴派的草创时期，以索邦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在法国据有稳固的地位。这份外省刊物虽然足以打破笼罩着史学界的沉闷空气，但要清扫史学研究中的陈腐气息和动摇权力集团的统治，又是谈何容易。因此，两人必须身先士卒，投入战斗。他们在年鉴杂志开辟了《争论和战斗》专栏，亲自撰写大量书评和论文。安德烈·比尔基埃尔在纪念《年鉴》创刊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指出，马克·布洛赫在刊物的每一期上都有书评发表，“最多的一年竟达200篇”^②。至于吕西安·费弗尔，因担任主编职务比布洛赫时间更长（布洛赫于1939年主动参军，法军战败后又投入地下抵抗运动，于1944年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同年英勇就义），他在年鉴杂志发表的书评和文章数量更多，据国立图书馆的统计，共有1400多篇，约占刊物篇幅的四分之一。^③

① 《大地与人类进化》，法国阿尔本·米歇尔出版社，1970年版，第7页。

② 见《年鉴杂志的诞生》，载《经济、社会、文明年鉴》1979年第6期第1350页。

③ 法国国立图书馆为纪念年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举办的“吕西安·费弗尔生平事业展”：《展品简介》第38—39页。

这些短小精悍、有的放矢的篇章都是犀利的匕首，锋芒直指外交史、政治史、事件史的要害。费弗尔和布洛赫针对埃米尔·布尔茹瓦的《外交史教程》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这是用历史舞台上上演的悲喜剧掩盖在幕后进行的真实历史运动。费弗尔断言，历史真实的内在的动因并不在于大人物的脾气和心血来潮，也不在于敌对双方外交官的纵横捭阖，而在于“地理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以及群众的知识、信仰和心理等因素”^①。另一方面，费弗尔1930年为弗朗索瓦·西米安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撰写的书评，马克·布洛赫在年鉴杂志第三期为莫里斯·霍尔巴赫的《自杀：一种社会病兆》撰写的书评，对开展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对史实概念的再认识提供了震聋发聩、启迪智慧的独到见解。他们批评那种筑起高墙、精心种植各自的葡萄园的狭隘观念，鼓励历史学家把目光移向邻居，使互不相认的兄弟进行对话。

年鉴杂志在二战期间，因德军占领等原因，几经更改刊名，自1946年起，称作《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既反映着刊物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也标志着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加入了编辑部以后，特别是在1956年费弗尔去世以后，新史学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布罗代尔的时期。

二、布罗代尔的早期经历

费尔南·布罗代尔于1902年8月24日出生在法国东部默兹省的卢内维尔村，在这个居民不到200人的小村庄，他跟随祖父母渡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长期的乡村生活使他对当地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因此，他在撰写《法兰西的特性》一书有关耕作制度、畜牧活动和工匠行业等篇章时，得以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① 吕西安·费弗尔：《为历史而战》，第63页。

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法国革命头三年期间的巴勒迪克》也恰巧建立在对家乡的调查基础之上。他曾多次酝酿为自己的家乡卢内维尔村写一部历史，这个愿望可惜未能实现。

他的父亲是位小学的算术教师，在巴黎远郊梅里埃镇上任职。父子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既短，性情又不尽投合，在生活中往往意见相左。尤其在1920年，小布罗代尔在伏尔泰中学行将毕业，一心指望报考医科，却遭父亲的断然阻止。迫于父命，他索然无味地进了巴黎大学的历史系。全靠天赋的记忆力，他居然顺利完成了学业，并于21岁那年通过国家会考，取得中学历史和地理教师的资格。这位年轻的历史教师于1922年被派往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中学、阿尔及尔中学任教，在地中海彼岸工作达9年之久（除1925—1926年服兵役外，直到1932年为止）。布罗代尔自己承认，他当时从事的历史教学，为参加1928年的国际历史年会发表的《西班牙人在北非》一文，以及从1922年起就着手准备的题为《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政策》的博士论文，仍然停留在政治史和外交史的范围。

但是，长住北非给予布罗代尔“全面认识”地中海的地理景观和历史作用一个绝妙的机会。对地中海的观察，由南眺改为北望，使他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如此，这位不倦的旅行家利用假期，遍游除埃及以外的地中海各国，而他最感兴趣的地方无疑是沿海城市的各档案馆和图书馆。犹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他走访巴勒莫市立图书馆，本想了解有关西西里贵族的历史文献，却偏偏找到了关于该岛甘蔗种植的大批档案。阅读和抄录档案是项颇费时间的工作，他从一位美国电影摄影师处买下一架旧摄影机，自制缩微胶卷（图书馆正式制作缩微胶卷还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明）。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他的史学眼光变得更加宽广，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个人的兴趣逐渐淡薄，而对地中海

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他于1927年与创导新史学的旗手吕西安·费弗尔取得了直接的联系，后者在一封信中向他指出：“认识柏尔人的地中海比对认识菲利普二世更加令人振奋”。这句话据说拨正了布罗代尔的研究方向。此外，同年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国际历史年会上，聆听昂利·贝尔和昂利·皮兰纳的学术报告，也为布罗代尔走上新史学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他后来说：“在1927至1933年间，我正不慌不忙地埋头于收集档案资料，虽然论文题目尚未最后选定，但我已经过深思熟虑，决心选择地中海。”^①

布罗代尔于1932年返回巴黎，先后在巴士德中学、孔多塞中学和亨利第四中学任教，接着在1935年动身去巴西圣保罗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巴西之行对布罗代尔是“一生中重要的时期”，他说，“正是巴西才使我对地中海的历史得出一种崭新的认识”^②，“远离故土产生的新奇感是认识的重要手段，它能帮助你更加全面地理解周围的事物，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③。正是在巴西，他有充足的时间，把在锡曼卡斯、拉古萨（杜布罗夫尼克）、威尼斯等档案馆拍下的长达几公里的胶卷仔细读完；在这“工作和思考的天堂”，他还与正在圣保罗大学文学系授课的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就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等问题交换看法，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但友谊甚笃。直到两人分别成为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的“一代宗师”时，他们始终像是一对“欢喜冤家”，总是把对方当作唇枪舌剑的论战对手。1937年10月，在从巴西返回巴黎的途中，布罗代尔与吕西安·费弗尔不期而遇，两人在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了作了20多天的促膝长谈。这次巧遇在布罗代尔的史学生涯中无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史学文集》第二卷，法国阿尔托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② 《地中海与巴西的撞击》，见法国《世界报》1985年11月30日第8版。

③ 《长时段》，载《史学理论》第4期，第111页。

疑是个转折点。在这以前，他虽然曾与费弗尔有过谋面的机会，但还停留于一般的社交关系。20多天的共同生活使两人达到了“意气相投”、“无话不谈”、“亲如一家”的程度^①。费弗尔对这位比他年轻24岁的后辈十分赏识，不久便推荐他担任高等实验研究院历史系的指导教师，介绍他与年鉴杂志的另一位主编马克·布洛赫认识。从那时起，布罗代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已成为新史学派的积极成员，虽然还是默默无闻、初出茅庐的一名小兵。

193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之际，布罗代尔应征入伍，在莱茵河边界服役。法国的马其诺防线于1940年崩溃后，布罗代尔在战场被俘，关押在德国美因兹、吕贝克等地的战俘营里，为时达五年之久。监禁生活是教人懂得耐心的学校，而最能排遣孤寂和烦闷的，对布罗代尔来说，正是他的《地中海世界》。就像“过电影”一样，在囚徒的记忆中，浮现着浩瀚的内海波澜壮阔、层出不穷的历史画面。他就这样在“练习本”上写成了考证精确、卷帙浩繁、内容庞杂的一篇博士论文。练习本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寄到了留在巴黎的吕西安·费弗尔的手里。在1947年，即在布罗代尔获释后不到两年，这篇长达1375印刷页（译成中文接近150万字）和广征博引的论文成功地通过了答辩，在法国历史学界，布罗代尔的这一壮举是前所未见、独一无二的。

法国的“解放”为新史学派和布罗代尔个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布罗代尔于1946年加入了年鉴杂志的编辑部，同年与吕西安·费弗尔一起创办了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系（经济和社会科学系），任该系的历史研究中心主任。新史学派从此声势大振，并逐渐由“在野派”上升到“当权派”的地位。毫不夸张地说，由布罗代尔领袖群伦的第二个时期也正是新史学派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① 这些话是布罗代尔夫人亲口告诉译者的。

三、布罗代尔的著作

当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于1949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正式出版时，吕西安·费弗尔亲自撰写了题为《走向另一种历史》的书评，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评论》发表。费弗尔指出，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博士论文“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野，它在这个意义上具有革命的性质。布罗代尔断然把西班牙的大政方针纳入到历史和自然地理的范围中去，首先研究了使人们的意志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和左右的经常性力量，他对这种起着引导、阻碍、遏制、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所作的分析是前无古人的，这种摆布人的命运的力量，轻描淡写地用一个词来说，就叫地中海。在第二部分里，他列举了各种特殊的、但有一定恒在性的力量，这些无名的集体力量能够用年月日标出其存在的时间，也就是说，它们是在16世纪下半叶，即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曾经起过作用的和可被捉摸到的力量。第三部分叙述历史事件：一大堆杂乱的、沸腾的和犬牙交错的事实。这些事实往往被第一部分研究的经常性力量所摆布，受第二部分列举的恒在力量的影响，但偶然性也在发挥作用，在总趋势的画面上绣出最引人瞩目和最出人意外的图样。”^①

以上这段引文对全书的内容和重点作了精辟而简要的概括。我们这里只要对历史的三个层次(结构、形势和事件)或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再加以补充和解释就够了。首先，《地中海》一书在研究深度上明显地超过了第一代新史学家的成果，更加精确地揭示了长时段结构因素(地理、气候、动植物和文化)对短时段政治事件的隐蔽的决定作用。费弗尔和布洛赫确实强调了

^① 转引自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史学理论》创刊号第49—50页，1987年8月15日。

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想以咄咄逼人的“总体史学”吞并各种社会科学，但布罗代尔则把历史的“时期和空间”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根据布罗代尔的时空观，观察和分析缓慢流逝的、有时几乎静止不动的历史，与社会学对现时的摄影相比，可以更加真实地显示社会的结构，更形象地说，社会学的调查尽管翔实可靠，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像剃须刀那么薄^①，而历史学对总体形象的粗线条勾勒，却能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表现为“经济态势”或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可供选择的“中时段”长达10年、25年、50年（孔德拉季耶夫周期）乃至100年（即所谓“百年周期”），例如1791—1817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1852年逐渐下跌。这种循环周期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至于事件，在布罗代尔看来，它们只是茫茫黑夜中萤火虫的闪光，或者夜幕笼罩下绽放的烟花，虽然光彩夺目，但却转瞬即逝。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崭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②

这部著作出版后很快成为“总体历史”和“比较历史”的经典名著，但在1966年再版时，作者不顾朋友的劝告，对全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彻底重写。1979年再版时又有新的增补。最后，在他的晚年，当有人问及《地中海》时，他声称这已不是自己的著作，而是“别人的著作”，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他对这个历史总体的认识不再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继承了注重考证优良传统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同时也努力超越自己，力戒制造固定的框框或模式，限制历史学家观察昨天的眼界。

① 《一生为了历史》，布罗代尔采访记录，载《文学杂志》第212期，第22页，1984年11月。

② 参看《长时段》，载《史学理论》第4期第105—107页。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布罗代尔的第二部名著。该书的写作计划是在1952年开始酝酿的。当时，吕西安·费弗尔建议与布罗代尔合写一部前工业化时期的世界史，题为《世界之命运》，由布罗代尔撰写物质文明部分，自己则负责精神文明部分。费弗尔于1956年去世，未能完成他的任务，留下布罗代尔单枪匹马，花去与《地中海》几乎同样长的时间，撰写成《物质文明》这部杰作。之所以称为杰作，一方面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布罗代尔个人事业达到了巅峰，另一方面他在该书中所使用的关于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层分立的形象，对经济学家认识市场经济的实质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这以前，不少经济学家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从而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布罗代尔在《物质文明》一书的结论中断然指出：“我认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①。他还揭示了混淆二者在政治上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国家，为消灭资本主义而压制市场经济是导致商品生产萎缩、比例关系失调和供求矛盾尖锐化的根本原因。如果我国的经济学家能及时读到这部著作，说不定也就没有必要于1991年再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问题进行争论了。

应该承认，布罗代尔对经济生活的三个层次作了巧妙的、独具匠心的安排。他把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统称为“物质文明”。这个由他发明、创造的新名词在西方国家的语言中容易引起误解：由于文明(或文化)本身属于精神的范畴，从构词学的观点看，“精神文明”几乎是同义反复，“物质文明”则是自相矛盾。实质上，物质文明包括着自给自足、以货易货、直接劳务交换以及家务劳动和“修配不求人”等准经济领域。这些被排斥在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中译本第732页。

市场之外的活动，即使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中，据说至少要占国民产值的30%至40%。这些“日常生活”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建立在基础之上的塔身，即生产与交换的正常机制，与农村活动、摊贩、店铺、作坊、交易会、交易所紧密联系，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以竞争为基本法则的“市场经济”。具有欺诈和独占性质的，并由少数大商人包揽的不平等交换构成宝塔顶，占着居高临下的地位，根据布罗代尔的定义，这就是资本主义。它的本质表现为：1. 始终建立在开发国际资源基础之上，其存在具有世界规模，其势力向世界各地伸展；2. 始终致力于巩固和扩大其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垄断；3. 始终未能并且永不可能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劳动。这就是说，没有塔基(物质文明)和塔身(市场经济)的支撑，资本主义也就丧失了立足之地。资本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排挤，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挖了自己的墙脚。在这个问题上，布罗代尔承认与马克思关于“剥夺剩余价值”的分析不同，他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完全建立在对工业资本主义观察的基础之上”，“假如马克思能接触到摆在我面前的所有资料，我相信他或许会改变他的一些观点。无论如何，他用长时段观点考察历史实在的方法只能使我为之高兴”^①。更重要的是，布罗代尔从来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喜欢历史哲学，不相信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会有结束的一天；在他看来，不平等既是社会的普遍规律，人就注定要生活在蜂巢、蚁穴一般的等级制度之下。

布罗代尔在接近70岁高龄时，才下决心撰写一部法国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他“留待晚年享用的一块白面包”，因为历史学家从来只是在叙述本国的历史时，才能真正做到得心应手。写作计划极其庞大，全书共分三大部分；《法兰西的特性》、《法兰

^① 引自布罗代尔的学术秘书玛丽-泰雷兹·拉比涅特小姐保存的一份“访谈记录”，采访者姓名和日期不详。